



□ 刘余莉

讲仁爱 与施仁政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于是放他们回家，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结果，到了第二年，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按时回到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太宗“以心感人”，离不开孔孟的仁与仁政思想的影响。

仁者爱人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为主要内涵的道德情感、道德规范、道德品质，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虽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仁者爱人。

孔子强调，这种仁爱“必由亲始”。家庭中的亲爱，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含义。“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源之水。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仁爱之心，“爱人”就是孝悌之外展与扩充，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显示于外的行为表现出来。因此，

此，“仁”的内涵还包括“忠恕之道”。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是积极一方。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可以说，“立人”“达人”，都是为他人着想，这就是“忠”；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恕”。曾子在概括孔子之道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实践仁德要从小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还足以害人。因此，“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那么，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方法就是“克己复礼”。具体而言，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动（起心动念）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本性相违背的一切私心欲念，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仁政：礼主刑辅

到了孟子，“仁”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充。他认为人皆有所爱，只要充分扩充这种爱便是“仁”。同时，孟子的“仁学”，又多从心性入手，他用“不忍人之心”或“惻隐之心”解释“仁”，认为“仁”的品质是人生而具有，道德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恢复人本有的仁心。将这种“不忍人之心”运用在政治上，就会

施行“不忍人之政”。

仁者爱人，在传统治国理政之中，表现为以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为内容的仁政。可以说，正是中国政治中这种讲仁爱的思想，是“中国之治”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关键。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对这种仁爱思想也深表认同。

《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对待君主就如侍奉父母一样。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到忧伤；国君有了危难，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反之，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样低贱，甚至还随意践踏、欺凌，人民反过来说不会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人民也不会为他分忧；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汤蹈火。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一体，那么国君有了困难，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而效力、分忧？

《六韬》记载，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方。太公回答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春秋左氏传》中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人有这种爱民如子的仁爱思想，因此在治国理政中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态度。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判案与其他法官一样，都是依据案情为人定罪。但是他和别的法官不同之处在于想方设法地杜绝争讼。如何杜绝争讼？就是要兴起道德教育，使人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典故，说的正是此理。

刑期于无刑

讲仁爱的从政者必须具备三种职

能：君、亲、师。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只要有仁爱之心，不仅会受到人民的爱戴，而且还能感化百姓，达到“刑期于无刑”的效果。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司狱官。他亲自判定对一个人实施刖足之刑。后来卫国动乱，季羔逃跑。被他判处刖足之刑的人恰好负责守护城门。但是这个人不仅没有借机复仇，反而协助他逃脱危难。季羔将要离开时问其原因，这个人说：您判定对我实施刖足的刑罚，是因为我罪有应得，您也无可奈何。当时您要用法律判罪时，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这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在我被判定罪刑，将要行刑时，您面带忧愁和伤痛之情。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特别偏袒，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就会产生怜悯之心。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帮助您的原因。孔子听了这件事后说：虽然都是依法办事，但是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太过严厉苛暴树立的就是仇怨。既能够公正，又显示了德行，季羔做到了啊！

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所以治国要顺应天道，对待民众讲求仁爱，不能过于苛刻。古人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理应爱民如子。《盐铁论》中写道：“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孟子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正是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孝经》中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正是因为重视礼乐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所以中国文化也被誉为“礼乐文化”。

（上接1版）

“每一个”的维度是人民的具体化。作为整体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最大多数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你、我、他组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这句话就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最好样本，所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提出了精准扶贫大方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进入小康，我们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就不能算兑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要“精准”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贫困人口，既不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更不让贫困人口通过统计数字“被小康”。

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务的就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放的也是这“最大多数”与“每一个”高度统一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为了人民，把“获得感”作为发展最鲜明的价值指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句话。时隔5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这句话。把人民的所思所想所盼作为最高价值指向，让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真正转化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自觉担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是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发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的。对中国社会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如果发展成果不能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能体现在美好生活货真价实的改善上。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不可能持续也不值得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持“两个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发展要让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但是随着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出现重大转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物质文化”这些客观“硬需求”的全部内容，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归属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

因此，当我们讲人民获得感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绝对”获得感，不能仅仅满足于人民群众今天得到的比昨天多，明天得到的比今天更多，还要在“相对”获得感上下功夫。坚持新发展理念，让人民的收获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市场上不同要素获得之间保持大体协调、同向共进，这是相对获得感的意蕴所在。从满足绝对获得感到提高相对获得感，这一变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现实内容，也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价值指向的更高标准，更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蕴含价值指向的高瞻远瞩。

依靠人民，为“当家作主”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就是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让人民以主人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头等大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政治制度的安排必须让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会运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利。已经有近70年历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把中国人民

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充分激发出来，汇聚成建设新世界的磅礴力量，让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理想变为了政治现实。

中国共产党深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仅表现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更体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的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这就需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探索民主制度的中国方案，让人民还可以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民当家作主又增加了一道制度保障。协商民主填补了选举民主之外的权利空白，可以有效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有效解决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权利跛脚”现象。协商民主不否定选举民主的根本性意义，而是直面选举民主的实践悖论。在选举民主的同时，辅之以协商民主，通过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让选举民主建立在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让民主的结果更有民意，更得民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商量中当家作主、在商量后行使权利，这才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才是真正以人民为中心。

服务人民，自觉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工具”

把人民当主人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是也不能是一句空话，最本质的体现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做人民群众的“工具”。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更加明确地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安排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更先进、更优秀、更强大，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管用、更好用的工具来创造历史，来改变世界，让人民群众通过中国共产党真实拥有创造历史的现实力量。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位为“先锋队”的本身就是一种对工具身份的自觉担当。《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提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一系列要求为中国人民塑造出了一个敢于牺牲、敢于斗争的锐利武器，塑造出了一个“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制胜法宝。有了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有了这样一个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政府，人民群众就更有力量、有途径、有手段在与市场、资本等外在力量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按自己的意志塑造市场、驾驭资本，让市场与资本“为我所用”，而不是“反客为主”。

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在人民面前讲什么“高人一等”，谈什么“专业分工”，党员干部最根本的身份就是勤务员，最本职的工作就是服务人民。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深入基层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了解群众的诉求才是真正的尽本分、做专业。

走向人民，走近群众，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但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更多、更丰富、更珍贵。以心交心，自会心心相映；我们心中装着人民，人民也会在心里装着我们；我们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有人民群众做后盾，不管多么大的风险挑战困难都可以克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为什么我们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与治理奇迹，因为我们身后站着“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拥有“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古人的“慎独”（下）

□ 李 萍

“慎独”既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更是一种道德境界。古人在不断感悟“慎独”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强调时时自省，做到“六慎”。

慎微。要求注意小节。据《康熙政要》记载，康熙皇帝曾告诫官员“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小心也”。要求下属“对自己所喜之人，有罪必罚；对所恶之人，不应加重处罚，做到据实论处，功过分明”。古人言：“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即讲究注重慎微，在最隐蔽的言行上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品质。世人要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防止小节上的蜕变。

慎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古人认为，口是祸福之门，特别是为官者，慎言慎语为官箴之要。据《说苑·敬慎》记载，孔子在参观周王祭先祖的太庙时，看到台阶右侧立着一个铜铸的人，但嘴被扎了三道封条，在这个铜人的背面，刻着一行字：“古之慎言人也”。意思是说：这是古代一位说话极其慎重的人。这给孔子以极大的震动和启发，因此，孔子在谆谆教诲弟子时，总是十分强调“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后来，人们便以“三缄其口

比喻“慎言”了。人们常用的“缄默不语”也由此演化而来。

慎行。强调办事谨慎。汉武帝时的丞相霍光处世小心谨慎，沉静稳重，可以为人臣之效法。《为官思想录》记载，他作为官言行举措都无比谨慎，“言动不可不慎。一言乖错，一动轻浮，至细也，面传而播之，必基于所言所动。”因此，要求为官者须战兢惕厉，时时提防，恐陷刑网，方可免于罪悔。若以是为得意之场、可乐之地，矜情放气以为之，而罔识顾虑，将入于险途，不能自脱矣！”就是要谨慎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谨守法度，寡交而不滥交。清朝名幕汪辉祖在其《佐治药言》中专列“慎交”一条，提出忠告：要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与民交往要言而有信，与同事交往要情如家人，“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兄长，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至也。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慎行，要求人要时时怀着敬畏之意，有谦德，在《尚书·大禹谟》中有明确的解释，“满招损，谦受益。谦虚，对上恭敬，对人礼敬，不恃才傲物，不张

扬，不卑下屈上，有主见，有才识，但敏而好学，好学不倦，求得知识、才智和道德的圆满，其反义在骄。”意即对上峰不倨傲、减少阻力；对士人，恭而有礼，礼贤下士，求得和睦的环境，以谦逊人格获得理解、支持，赢得政声；对同事，和而不同，宽容处世，使同事谅解难处，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对民，则以仁爱之心，护民，利民。反之，则不然。

慎欲。控制欲望，因为过度的欲望就是贪婪。要做到“欲而不贪”“以义制利”。清代著名学者唐甄在《潜书》中说：“人之情，孰无所欲！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则弃之，是为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强逐之，是为鄙夫。”明确指出了人要分清欲望的正邪，正当的欲望就支持，不正当的就抛弃，这样的人是君子。否则，正当的欲望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不正当欲望还要去强求，就成了浅薄卑劣的小人。他还指出：“为学之道，制欲为先。彼出而不能反，申而不能屈，必至溺其身，堕其名。博学智士，蹈此者多矣；此无他，欲败之也。”人应该把控制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如果欲望发出而不能收回，伸展开来而不能抑止，必然导致身心名誉的毁败。

慎权。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是一种责任。权力可以使人高尚，也可